

浙大中文学科百年历史发展与现实思考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代序

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及其演变

核心词的确切含义及词频导向的构建方法

阿剌吉考略

禅思与诗思之会通
——论苏轼、黄庭坚以禅为诗

两种历史方法的异同
——从《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看福柯的
历史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论诗歌作品的翻译特点

浙江当代文学总体特色与文化成因

从“悲凉的乡土”到“春回地暖”
——王西彦乡土小说创作轨迹

中文学术前沿

第二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文学术前沿

第二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学术前沿 .2/《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308-09225-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2534 号

中文学术前沿(第二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379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225-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骧 严家炎 吴元迈 吴熊和 裘锡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一新 王德华 池昌海 孙敏强 苏宏斌

汪维辉 李咏吟 吴秀明 吴 笛 张德明

周明初 胡可先 姚晓雷 徐 岱 徐 亮

黄笑山 黄 健 盘 剑 楼含松

主 编：吴秀明

副 主 编：黄笑山 胡可先 吴 笛

本辑执行主编：黄笑山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出版

浙江大学中文系是随着西学东渐,由传统书院教育向现代专业教育转型的产物。百年历史,风云激荡,中文系和其所属的大学一起,始终立足民本,以温煦的人文情怀关注时代,为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共分三卷,分别为总论卷、教师卷、校友卷,近一百五十万字,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学科史论

浙大中文学科百年历史发展与现实思考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代序…………… 吴秀明(1)

语音史纵横

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及其演变…………… [日本]平山久雄(6)

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微、日二声母

——敦煌写本别字异文所见…………… 黎新第(14)

元代杨桓的《书学正韵》与《五音集韵》…………… [日本]大岩本幸次(20)

核心词探论

核心词的确切含义及词频导向的构建方法…………… 江 荻(36)

汉语核心词“腹”音义研究…………… 黄树先(49)

古音义溯源

阿剌吉考略…………… 徐时仪(60)

颜师古《汉书注》中“读”的音义考辨…………… 万献初(67)

古汉语中的增项变读构词…………… 王月婷(77)

谈《老子》的“不仁”说

——兼论以儒释老的谬误…………… 王继如(84)

古典文论

禅思与诗思之会通

——论苏轼、黄庭坚以禅为诗…………… 张高评(91)

南宋“论词”诗四首析论…………… 王伟勇(102)

文果载心 余心有寄

——从《文心雕龙》起结看刘勰持论的文化心理…………… 孙敏强(116)

论王勃佚文中两篇为女性所撰墓志	[日本] 道坂昭广(124)
-----------------------	----------------

批评视角与方法

两种历史方法的异同

——从《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看福柯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 徐 亮(129)

论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的双重文化反思	章 涛(138)
--------------------------	----------

经典译介与传播

论诗歌作品的翻译特点	[俄罗斯]И.布勃诺娃(146)
------------------	------------------

从“神韵说”看朱生豪翻译思想	刘云雁(150)
----------------------	----------

叶芝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胡则远(157)
-------------------	----------

浙江当代文学研究

浙江当代文学总体特色与文化成因	任茹文(163)
-----------------------	----------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的湖州“80后”女作家创作	秦晓帆(170)
-----------------------------	----------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调和

——《江南》及其文化现象探析

庄丹华(179)

校友创作论坛

从“悲凉的乡土”到“春回地暖”

——王西彦乡土小说创作轨迹

张志平(187)

忧郁目光下永恒的受难者

——论王西彦小说中的人物谱系

陶 键(194)

附：王西彦著作书目	艾 以(201)
-----------------	----------

序跋书评

一部值得一读的“康德美学”研究著作	王元骧(205)
-------------------------	----------

“本事书”

——序《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

鲁国尧(207)

直面 20 世纪 40—70 年代文艺批评话语的研究理路	陈思和(212)
------------------------------------	----------

浙大中文学科百年历史发展与现实思考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代序

吴秀明

内容提要：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一个知识专门化组织，浙大中文系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百年的积淀，使它逐渐形成了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传统和以“三古”见长的研究格局，并开始呈现出了新兴学科“历史化”与传统学科“现代化”的发展态势。在当下社会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下，中文学科原有的内涵和功能事实上都在发生变化，它也遭受到了社会世俗化、教育市场化、学术评估指标化等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但只要守正创新，力戒浮躁，真正按照规律办事，中文学科一定会在现有基础上有大的发展。

关键词：百年历史；学术传统；现实思考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一个知识专门化组织，中文学科是随着西学东渐，由传统书院教育向现代专业教育转型的产物。百年历史，风云激荡，中文学科和其所属的大学一起，始终立足民本，以温暖的人文情怀关注时代，为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浙大中文学科也不例外，所不同的，似乎在构成和发展上显得更复杂和曲折，因而更富有独特的个性和色彩。这里所说的复杂和曲折，就其大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纵向时间来看，它先后经历了“母体”孵化新的分支、又由分支复归“母体”这样分分合合的过程，由这些分分合合，它也必然派生可以想见的对分支或“母体”的不适，有一个由不适到逐步适应的过程；而就横向空间来看，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整合了之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包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龙泉分校、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临时总校等）、英士大学、原浙江师院、杭州大学、原浙江大学（即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等办学背景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国文系或中文系（门），最后诸流汇聚，于1998年融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而成为现在的浙大中文系。如果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时延请名家开设国文课程算起，浙大中文系已历春秋110余载，倘若将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浙大中文系的源头，那么它迄今已走过近百年风雨沧桑的历史。

浙大中文系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它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节律，自己的性格与命运。回顾往昔，也许与年龄不无关系，我听得最多、感受最深的是这样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于60年代，余生晚矣，所以虽心向往之，但却无法返回那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我主要是从我的师辈那里聆听到“老系的故事”，以及谱写中文“老系”历史精彩华章的夏老（夏承焘）、姜老（姜亮夫）等老教授的故事，通过自己想象去打造我心中的中文系。至于80年代，我多少倒是赶上了那时的一点“尾巴”，曾真正切实地感受和体会到在走出十年阴霾之后一个“老系”如何老树新花，焕发昔日的青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我还亲眼目睹了夏老、姜老等名师大家的风采，甚至我还有幸目睹姜老在旁人的携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以“老马识途”的身份给大一新生

进行学术启蒙,并在某个晚上叩门向他请教一个学术疑难问题,有幸听到王驾吾(王焕长)先生讲授《韩非子》、《墨子》,与孙席珍先生多次在一个小组里讨论……

也许是历史记忆的缘故吧,现在人们谈论中文系,讲得最多、最集中的往往就是上述这两个阶段,它似乎成了中文系的一个“传统节日”,一个百讲不厌、反复演绎的“原典故事”。特别是每逢系友聚会、每次同学会(尤其是年长一辈的同学会)更是如此,它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中文系是一个特别“瞻前顾后”的传统学科,它本身就充溢着浓重的感念情怀。也因此故,我们的不少系友似乎更认同那个时代的“老杭大中文系”,“老杭大中文系”不啻成了他们的精神圣地。而“老杭大中文系”作为现在浙大中文学科的前身,它在1958至1998年这40年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继承之江大学国文系和老浙大中文系(门)传统的基础上,的确以其难能可贵的两度辉煌为延绵至今的浙大中文系作出了贡献,增添了璀璨夺目的精彩华章,这是很了不起的,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讲浙大中文学科的历史,无论如何是不能绕开“老杭大中文系”的。正是它,给我们今天中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筑就了很高的学术平台。

追忆中文系历史,人们自然很容易聚焦于那些著名教授。与国内外其他不少名校一样,浙大中文系在其漫长的办学历史中,曾涌现一批灿若繁星、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名师大家,如徐昂、刘大白、沈尹默、祝文白、马叙伦、钱基博、钟泰、郑奠、许钦文、邵祖平、陆维钊、钱南扬、郭斌龢、夏承焘、王驾吾、沙孟海、胡士莹、徐震堃、姜亮夫、钟敬文、缪钺、孙席珍、林淡秋、王季思、萧璋、陈学昭、任铭善、陈企霞、王西彦、詹瑛、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郭在贻等。尽管我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些名家经过后人的不断诠释多少已被“经典化”了,他们与作为自由率性、立体鲜活的人文教授的“他们”也许并不完全吻合;但从历史高度来看,从他们对中文学科所作的贡献和人格魅力来看,我们不得不发自肺腑地对他们充满仰慕和感激之情。我们不会忘记,无论是在动荡的岁月,还是在和平的环境,他们在历史各个阶段留下的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足迹与身影。他们不仅以高尚的师德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而且以深厚的学养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浙大富有特色和优势的中文学科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创造性的贡献。自晚清起始以迄于今,浙大中文系之所以能坚守学术命脉,不为时势左右,很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的引领和示范。他们无愧是中文系的功臣。如今,这些堪称时代中坚的名师大家早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知识、思想和人格却一直在滋养着后人;其中不少成果至今依然成为代表中文系最高学术成就和水平的一个“标杆”,一个很难逾越的学术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是有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创造,才使浙大中文系迅速崛起于东南,成为名重一时的学术重镇;也使我们今日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硕博兼及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水平的中文一级学科;从教学建制来看,从原有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现在拥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3个专业和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层专业。

追忆中文系历史,我们还不能忘记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是他们在五洲四海、世界各地,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不懈努力,在传承浙大中文系薪火、倾情为社会和人民奉献心血及智慧的同时,也给浙大中文系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一所好的大学,一个好的系科,光有教授(包括著名教授)是不够的,它还应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生。而能否培养这样的优秀学生,这也是衡量一所大学和一个系科的很重要的标志。毕竟,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我们的主要“产品”是人才。而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恰恰也是浙大中文系的一个传统。我的师辈不止一次地告知,他们在求学乃至毕业以后是如何得到包括夏老、姜老在内的中文系老师的循循教导,无私的关心、帮助和提携,师生之间保持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及此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文系培养的学生中有像作家琦君(后去台湾)、翻译家朱生豪、园林学家陈从周、新闻学家金仲华等声名远播的名师大家,有遍布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政界、商界企业界等各个

行业、各个领域的大批领军人物和精英骨干,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这种良好互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一所大学和一个学科而言,学生与教师同等重要。我们在谈中文系及其成就和影响时,没有理由不将学生纳入视野。可以这样说吧,浙大中文系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打造的,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教学相长又相互激励的“精神共同体”。中文系之所以有今日,这之中自然也包含了历届学生的努力和劳绩。正因此,我们在编纂三卷本中文系史时,专门做一卷“校友卷”,用这样一种方式对包括至今仍奋斗在海内外各行各业的从浙大中文系毕业的广大系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当然,作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传统学科,浙大中文系还须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它的传统。百年的历史,浙学的影响,名师的垂范,使它逐渐形成了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在二年前为中文系编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钱江新潮文丛》序中,我曾把它具体诠释为:“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认为中文系“求是博雅”的系训,就很好地概括和体现了上述这样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它生生不息地“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浙大中文系的教学、科研、学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而从学科的角度看,我认为中文系的传统“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在这方面则表现尤为突出。它们高度重视文献史料,强调建立在言必有据、真实可信史实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使之哪怕在五六十年代比较闭锁的时代条件下也能较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樊篱,而拿出了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大学中文系主要由“传统”与“新兴”两大学科群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前者一般在各大学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像浙大中文系这样“传统”学科如此齐整,成就和影响又大的,似乎并不多见。由之,它也为中文系赢得很好的学术声誉,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其深厚根须一直伸展到现在。

中文系上述这一学术传统,我们今天当然要十分珍惜——不仅要珍惜,而且还要将其发扬光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传统的“三古”毕竟不是中文系的全部,它不能也无法代替其他新兴学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90年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和“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型,时代的嬗变与嬗变了的时代对中文需求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中文自身在这样的背景和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其原有的内涵及其功能事实上也在发生变化。今天毕竟不是五六十年代,也迥异于“五四”或三四十年代,我们现在似乎很难产生满腹经纶、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名家大师;今天大学实施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量多面广的大众化教育。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中文及其传统的“三古”产生影响。而从中文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来看,传统的“三古”也需要在方法论和思想观念上有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同样的,新兴学科的成长,也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学术生产和运思方式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浙大中文系一些新兴学科——先是文艺学,嗣后是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语言学、影视文学、编辑出版学等应时而起,有的还于传统的“三古”之后相继建立了博士点;与此同时,传统的“三古”也出现了一些新变,一向比较推崇实证考据的他们也开始既考又论。受西方文化思想和时代风尚的影响,年轻或较年轻的一代更进而尝试新方法论或准新方法论等研究方法;反之,新兴学科则开始比较自觉地重视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文学与史料学结合起来,致力于从传统的“三古”那里寻求借鉴,以求提升自己的学术层次、规格与水平。1999年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和2000年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对中文系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浙大中文学科建设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初步形成了古今会通、中西兼融、语言与文学并包的多元立体的格局。先前的传统“三古”一枝独秀乃至独尊的局面有了很大乃至根本的改观。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蕴生并呈现了新兴学科“历史化”与传统学科“现代化”的研

究态势。尽管这是初步的,但它却表明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已与时俱进在发生嬗变,一种新的学科交叉融合有望出现。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传统的“三古”依然是我们的强项,这个长期累积的优势特色不能丢,也丢不得。当然它应与其他学科平衡协调地发展,并且积极应对现实、与之形成能动的对话关系,不仅像以往那样继续传承中国文化,而且还要进而传播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三古”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它的潜力和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浙大中文系是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有过辉煌与荣光,也不乏坎坷与落寞。在近十年来,特别自1998年四校合并、结束分分合合回归“母体”以来,在新浙大的总体格局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长征”。一方面,中文系在经历的“回归适应期”的过程中,在全系同仁和广大系友的努力及积极支持下,在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市场化的大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冲击。中文系在艰难的语境下左冲右突,谋求自己的发展之道,表现出了一个老系应有的顽强和执著。不必讳言,浙大中文系当下的确碰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面临的生存处境也有些尴尬:从外部“生态”来看,周边有关高校中文系(包括新办的中文系),他们为了自己学科的发展往往励精图治,行非常之道,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压力,而且对比全国绝大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实体”状态,浙大中文系办学也存在体制上的挤压;从内部“生态”来看,社会科学如经济学、金融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因与“经济中心”直接或比较对接而逐渐成为大学文科话语的执掌者,它们讲求“实用”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对着重讲精神、情感、审美的中文学科,也形成了一个不可小觑的严峻挑战。但我们无须杞人忧天,浙大中文系百年历史也告诉我们:困难和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对困难和问题的认知以及解决它的决心和办法。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做到了,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不能克服,能阻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对中文系来讲,从来就没有迈不过去的门坎。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应该有。

北大中文系前些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应对新形势的策略,叫“守正创新”。我想在这里不妨借而用之,作为参考。以我个人之浅见,中文系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除了大的文化生态环境等超出我们能力和范围等原因外,就我们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中文系要“守正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有大的作为,也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浴火重生之路:如何面对整个社会世俗化、教育市场化、学术评估指标化的生存环境,力戒浮躁,真正按照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学术研究规律和学科建设规律办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学术的关系,在继续保持传统“三古”优势的同时,根据时代发展和现有的客观实际,凝炼适合中文系实际的兼容中西、打通古今的学术方向,寻找新的学术突破口;如何探寻在尊重学术多样化和个体独立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融个人与团体于一炉的有效的新的学术运行机制,推出整合团队整体综合力量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在主流的学术圈子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加大横向文化传播的力度,寻找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对话交流,使中国文学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走得好”,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和纵横驰骋的天地;如何在关注自己专业、练好内功的同时,介入当下社会改革与国家文化思想建设,发挥作为重点大学人文学科应有的“思想库”和“文化智囊”的作用,不仅充当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而且更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人文精神的建设者,等等。上述种种,现成的结论和做法显然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它的价值和魅力恰恰也正在于此。只要我们用心去探索、尝试和体验,相信总会有收获。未来的成功,从来都是属于它的探索者的。

在即将结束这篇不无冗长的序言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同事与我讲的一段话,他说:每一代学者似乎都有一个宿命式的拐点,对于民国年间的教授们来说,抗战是一个转折;对于由民国进入新中国的教授们来说,解放是一个转折;对于吴熊和、王元骧直到你们这一代教授们来说,“文革”是一个转折;而对于我们四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来说,8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波直至90年代初期市场经

济的启动则是一个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是对学术和思想乃至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他所说的是契合中文系几代人学术思想实际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学术与世俗”或者说是怎样在世俗化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中文系固有的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看作是考量新一代中文文学人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呢?显然,这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年轻一代,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借助前辈的经验、智慧、思考和探索,会做好这个课题的,而且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不仅把中国文学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传播出去,使之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现在四十岁左右以及更年轻一代的新的学人象征和代表着浙大中文系的未来,时代对他们提出了不同于我们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辜负时代对他们的期待的,他们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浙大中文系引向更加多元、更加开阔、也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书编纂起始于2008年上半年,前后历时三年多。其初衷是想为汇承两浙学风、春秋近百载的浙江大学中文系作传,使其历史面貌得以清晰,其精神华彩得以彰显,其优良传统得以发扬,为未来学者感受当代之中文教育提供真实的个案记录。为达此目标,完成这项工作,系里专门成立了系史编纂委员会,先后组织了70位左右中文系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了此项工作,并聘请吴笛、黄健、陶然三位先生担任分卷主编,具体负责编写。由于系史编纂牵涉到近百年的人和事,支脉庞大而错综,资料需求相当高。而浙大中文系几经变迁,相当多的历史没有留下记录,或者记录的文字在变迁中不幸遗失,特别是建国之前的相关材料,十分缺乏。教师和系友,遍布天南海北乃至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无迹可寻,有的早已作古,其相关生平事迹的材料,搜集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尽管全体参编师生煞费苦心,通过各种途径和想尽各种方式去解决,但还是留下了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遗憾,以至出现几度停顿、似难推进的局面。我们在编纂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我想,时不待人,先编出来,有总比没有好。所以就坚持地做下去,拿出这样很不成熟、甚至有点名不副实的所谓的这套“系史”丛书。

最后,借此机会,我要向三位分卷主编以及参与编纂的全体同学表示诚挚的谢忱,我相信历史也包括中文系的师生和历届系友会记住他们的。同时,我也向秦亢宗、邵海清、雪克、平慧善、陆坚、陈坚、吕洪年、何春晖等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编纂的有关领导、老师、系友,以及浙大档案馆、浙大校史馆、浙大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等有关同志道一声真切的感谢,特别是秦亢宗、陆坚、陈坚三位先生,还不辞辛劳地为本书作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和最终把关;没有你们热情鼓励和鼎力相助,本书也不可能如愿得以出版。当然,对于本书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造成和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希望在求得老师、学生和系友谅解的同时,能得到批评和指正,并期待日后有机会推出修订版。这也是我和三位分卷主编共同的一个愿望。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拟于2011年10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中古汉语的人声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及其演变

[日本]平山久雄

内容提要：本文描述中古汉语的人声韵尾-p、-t、-k 在现代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情况，并对其历时演变加以概述。“序论”一章说明吴音、汉音的区别，并以汉数词的读法为例，介绍两种音并存的具体情形；“单字音”一章介绍汉语的人声韵尾-p、-t、-k 在单字读法中的反映规律及其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历史；“促音化”一章描述入声字作为两字词的前字时的替换规律，并介绍入声数词在其规律中的特殊性质。

关键词：中古汉语；入声韵尾；日本汉字音；吴音；汉音；汉语借词；促音化

一、序论

1.1 本文在先人归纳的基础上据作者(1932年生,东京人)自己的读法加以整理,来描述中古汉语的人声韵尾-p、-t、-k 在现代日语汉字音中反映的情况,并据学者所研究考证的成果概述其历时演变。希望本文能为对日语中的汉字读法以及汉语对域外诸语的深刻影响有兴趣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材料。

本文在平山久雄(2005)^①的内容基础上加以修订和增删而成,在这过程中承上野善道教授(日语学、普通语言学家)提出意见,并介绍有关文献,我才得以改正一些错误,兹志感谢。关于中古汉语的鼻音韵尾的反映情况,参见平山久雄(2011)^②所述。

本文采用的现代日语罗马字拼音是对日本惯用的罗马字拼法加些改动的,以便符合现行的假名拼法;假名拼法比实际的发音有些保守之处,例如本文把“合”、“十”(一般写 gō、jū)分别据假名拼法ごう、じゅう来写成 gou、juu。日语罗马字 z 表[dz],j 表[ɕ],y 表[j];收语音-n 的现代基本音值是[-N],不过它同化于后面辅音的发音部位以[-m](p-、b-、m-前^③)、[-n](t-、d-、n-前)、[-ŋ](k-、g-前)、[-ɹ](s-、sh-、z-、j-前)等变体出现。

所举例词的涵义除了与汉语基本相同或从字面上大略可知者以外在括弧内记之。

1.2 首先让我把日本吴音和汉音的区别简单介绍一下,作为下文叙述的基础。

吴音是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初期以前日人已经熟悉的一套汉字读音系统,其来源不甚明

① 平山久雄：《中古汉语的人声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第11期,2005,第6-13页)。

② 平山久雄：《中古汉语的鼻音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及其演变》(《中国语学研究》开篇,Vol. 30,2011即刊,好文出版,东京)。

③ 罗马字或写-m,如“新闻”(报纸)shimbun。

了。汉音则是在 8、9 世纪从中国长安一带学来的当时被认为“标准”的字音系统。两种系统并立之初吴音称为“和音”(“和”指日本),汉音称为“正音”,稍后借用了唐朝通行的“吴音”、“汉音”的称呼^①,就叫“吴音”、“汉音”了。现在,一个汉字读吴音多是在日语中习用已久,口语里比较常用的词语中;读汉音则多是在较文的,或近代以后用开了的词语(包括日人新造的汉字词)中。此外,佛教词一般读吴音,儒教词则倾向于读汉音。

高本汉(Karlgren B. 1915—1926^②)书末所附的“方言字汇”据《汉和大辞林》、《汉和大字典》收录了 1600 多汉字的吴音、汉音,不过高氏对此特加注语说(汉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542 页):“我们得时常记住那些音读大都是理论上的读音,好些读法是现在口语所不用的。”

正如高氏所云,明治间(1868—1912)以来刊行的各种“汉和字典”(“汉”表示汉语文言)所记字音有不少是据韵学理论推演的人工读音,并不反映实际的情况。现实存在的吴音和汉音并不一定与字典中所录的相合,且有不少字只有吴音,或只有汉音,缺少与之对应的汉音或吴音。此外,在不少音韵条件下吴音、汉音都是同音,无法相互区别,例如脂韵开口吴音、汉音都念-i,所以“脂”shi、“悲”hi、“梨”ri 等说不上是吴音还是汉音,只能根据全浊声母与次浊鼻音声母的反映形式来判定“自”ji、“尼”ni 等是吴音,“迟”chi、“美”bi 等是汉音。

1.3 我们在这里以数词“一”到“十”以及“百”为例,介绍一下吴音和汉音在现代日语中存在的一个具体事例。这些数词的现代读音如表 1。括号内所记的是按理如此,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读音。在现代日语中,数词多用汉语借词,日语固有的数词在 10 以下还与汉语借词并用,至于 11 以上除了在个别复合词如 hatsuka(二十日)、hatachi(二十岁)、misoka(三十日)及一些雅语中以外几乎不用了。

表 1 汉语的数词在日本吴音与汉音中的读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百”
吴	ichi	ni	san	shi	go	roku	shichi	hachi	ku	juu	hyaku
汉	itsu	ji	san	shi	go	riku	(shitsu)	(hatsu)	kyuu	(shuu)	(haku)

这些数词大多是吴音的读法占优势,甚至“七”、“八”、“十”、“百”缺少汉音。“一”的汉音 itsu 只用在“统一”touitsu、“同一”douitsu、“均一”kin'itsu、“一に”itsu'ni(副词,表“专”义)等书面语性质较浓的一些词里。“二”的汉音 ji 基本只用在人名中,如“二郎”jirou、“信二”shinji。“六”的汉音 riku 只用在“六朝”rikuchou、“六书”rikusho、“六艺”rikugei 等一些学术词里。只有“九”,汉音 kyuu 占优势,例如“九阶”(九楼)、“九回”都念 kyukai,“九个”念 kyuko,没有念 kukai、kuko 的,这应该是“九”的吴音 ku 和“苦”ku 同音所致^③。只有单念时以及一些长久惯用的词语中念 ku、kyuu 都行,如“九人”ku'nin~kyuu'nin、“九年”ku'nen~kyuu'nen、“十九”juuku~juukyuu。

① 日本僧人安然所著《悉曇藏》卷五云:“此两法师共说吴音、汉音。且如‘摩’字、‘那’字、‘泥’字、‘若’字、‘玄’字、‘廻’字之类,吴似和音,汉似正音。”“两法师”指的是“正法师”和“聪法师”,他们分别于 847 年、877 年从唐朝回国。参见平山久雄:《日僧安然〈悉曇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中文分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7 年版,第 1-20 页);《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13-141 页。

② Karlgren Bernhard. 1915—1926: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E. J. Brill, Leiden. 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中国音韵学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③ “四”的音读 shi 比较少用,常以训读(即固有日语词)yon(多用于单念或后字带非鼻音辅音时)~yo(多用于后字带鼻音辅音时)来代替,如“四阶”yonkai、“四人”yo'nin、“十四岁”juuyonsai,这是要回避与“死”shi 同音的缘故。“七”shichi 往往也以训读 nana 来代替,不过这是两可的,如“七阶”shichikai~nanakai,参看 3.3 脚注。这可能源于要回避与“一”ichi 音近,恐怕也源于要回避与“质”shichi 同音,“质”读 shichi 表示抵挡。

二、单字音

2.1 下面表2里介绍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p、-t、-k在现行的日本汉字音(单字音)中所反映的规律以及一些例字。标音后面在括号中记其古代来源(古今无变者不记)。一种入声韵尾在日语中有两种对应形式而其间能看出音韵规律时以“;”,看不出规律时则以“,”隔开。

2.2 在下面表2中,与汉语-p对应的-u是从古代日语的*-pu变来的。古代日语的辅音*p-在词头经过双唇擦音而变为h-,如*pana>hana(花),*-pitō>hito(人)^①;在复音词中间则变为零(元音a前变为w-),如*kapu>kau(买),*-kapa>kawa(河)。与汉语-p对应的*-pu也就顺着这一条演变之路而变为-u了^②。要注意:这样产生的-u并不是汉语式的韵尾,它本来在发音节奏规律中具有一个音节的资格,虽然现在已变成了前面元音的拉长成分,但拉长的幅度几乎与一个音节相等,所以例如“甲”kou[kō]跟“没”botsu的音长是几乎相等的。

表2 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在现行日本吴音与汉音中的反映

中古	吴音	汉音
-p	-u(< * -pu)多, -tsu(< * -tu)少	
	“拾”shuu (< * sipu)、“甲”kou(< * kau< * kapu)、“蝶”chou(< * teu< * tepu), “立”ritsu(< * ripu)、“接”setsu(< * sepu)	
-t	-tsu(< * -tu)多, -chi(< * -ti)少	-tsu(< * -tu)
	“热”netsu(< * netu)、“阙”batsu(< * batu)、 “质”shichi(< * siti)、“钵”hachi(< * pati)	“没”botsu(< * botu)、“质”shitsu(< * situ)
-k	-ku; -ki(曾摄三等)	-ku; -ki(梗摄三四等)
	“独”doku、“益”yaku; “力”riki	“木”boku、“力”ryoku; “益”eki

与汉语-t相对应的-tsu、-chi也是随着日语中的音变规律从*-tu、*-ti变来的。

由此可见,日本人曾在-p、-t、-k后面添上一个元音*u或*i来模拟了汉语入声字的韵尾。这是由于古代日语没有以辅音收尾的音节^③的缘故。

2.3 其实,在-p、-t、-k后面所添加的元音最早并不限于*u和*i两种。在7、8世纪的文献中有一些利用汉字的音读来书写日语地名、人名的例子,其中用入声字的如(加底线者为入声字及其所代表的古代日语音节):

“塔志”*tapusi、“宇合”*umakapi、“壹师”*itisi、“葛饰”*katusika、“筑紫”*tukusi、“博多”pakata、“伊达”*idate、“乙训”*otökuni。

这些专名韵尾后所添加的元音除了*u、*i还有*a、*e、*o、*ö。*u、*i的分配也比较随便,没有后代那样有规律。用汉字音来给日语词对音,难免临时迁就的因素,但同时也会反映出当时日人对入声字的读法尚有不很固定的情形。那个时代写定的这些地名,有的沿用至今,例如东京有“葛饰区”katsushika-ku,福冈市有“博多区”hakata-ku等,构成日本地名难读的一个原因。专名以外“博士”hakase(< *pakase,也念hakushi)一词还保留着这一类的读法。

① 古代日语没有辅音*h-,因此现代日语的h-除了在近代的外来词中以外都是从古代的*p-变过来的。

② 战前的假名拼法采取历史主义,把从古代pu来的u都写“ふ”(hu),例如“拾”曾写作しふ(shihu)。

③ 日语曾经存在*-t要算是例外情况,看2.4所述。

日本古代诗歌总集《万叶集》,撰于奈良时代(710—784)后期,因当时还没有假名,所以借用汉字的“训”或“音”来书写日语。用“音”时,汉语的入声字照例代表日语的两个音节,其中第二音节是 *pu(一部分是 *pi)、*ti(一部分是 *tu、*to、*tö)、*ku(一部分——主要是曾摄——是 *ki),如“飒” *sapu、“杂” *sapi、“沓” *iti、“萨” *satu、“越” *wotö、“各” *kaku、“拭” *siki。这些应当是反映了当时日本汉字音的情况,里面也有一些不符合后代的规律的,如“杂” *sapi、“越” *wotö。

2.4 至平安时代(794—1192)初以后,就出现了在佛经、字书及其他汉籍抄本上以假名注音的材料。在这些文献里,入声韵尾后添加的元音几乎规划为 *u、*i 了。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1234年抄写,注音承袭 1032 年成书的《大盘若经字抄》)和长承本《蒙求》(有 1134 年识语,注音承袭 10 世纪的某种文献)两种抄本要算是现存最古的包含大量假名注音的材料,分别可作为古代吴音和汉音的典型代表。沼本克明(1995^①)对这两种抄本的音注按汉语的声、韵、调加以整理而作成了〈分韵表〉。据此归纳,入声韵尾的写法大约如下:

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 吴音

- p: *pu(フ) 如“纳” *napu、“甲” *kapu、“摄” *sepu
- t: *ti(チ) 如“蜜” *miti、“刹” *seti、“渴” *kati
- *tu(ツ) 如“窟” *kutu、“佛” *butu、“越” *wotu
- k: *u(ク) 如“木” *moku、“肉” *niku、“极” *goku
- *ki(キ) 限于曾摄职韵 如“直” *ziki、“色” *siki、“力” *riki

长承本《蒙求》: 汉音

- p: *pu(フ) 如“合” *kapu、“急” *kipu、“猎” *repu
- t: *tu(ツ) 如“密” *bitu、“窟” *kutu、“葛” *katu
- k: *ku(ク) 如“木” *boku、“药” *yaku、“直” *tyoku
- *ki(キ) 限于梗摄三四等 如“刷” *keki、“石” *seki、“壁” *peki

关于上面的 *ti、*tu,学者多认为:当时日人念诵佛经或其他典籍时,把汉语的 -t 读成一种塞音 *t,后面不带元音,不过这种 *t 在节奏规律上和一个音节相等,舌尖的闭塞有一个音节的长度;由于它没有专用的假名,只好借用假名 *ti 或 *tu 来表示,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的吴音大致在元音 *u、*o 后写 *tu,在 *i、*e、*a 后则写 *ti,其实它们代表的都是这么一种 *t 音;这种 *t 由于有点难发,后来就一律添上元音 *u 读成了 *tu,现代的 -tsu 是由此而来的。这种读法本是一种读书音,在很早被借进日语口语里的一些汉语词则已在借入时以 *ti(>-chi)来模拟汉语的 -t 尾,参见 2.6 所述。

2.5 如表二所示,汉语的 -p 在少数字里读为 -tsu,即:“拉” ratsu、“杂” zatsu、“飒” satsu、“压” atsu、“接” setsu、“摄” setsu、“立” ritsu、“蛰” chitsu、“执” shitsu、“湿” shitsu。

小松英雄(1956)^②认为,这该是类推的产物:在这一类字当中有些字在 13 至 15 世纪的文献中常与 *suru(做)结合构成一个动词,如“接する”(相接) *sepusuru 等,后来它随着 *pu 尾字的“促化”(看 3.1)就变为 *sessuru,和 *tu 尾字的促化形式同音,于是由此而类推,连单字都念 *tu 尾了;此外有些字由于常与清音字构成一个复合词,如“执权” *sipuken、“执政” *sipusei、“飒飒” *sapusapu,因此也产生了同样的类推音变。

① 沼本克明:《吴音、汉音分韵表》,筑岛裕(编)《日本汉字音史论辑》,(东京)汲古书院 1995 年版,第 121—243 页。

② 小松英雄:《日本字音における唇内入声韵尾の促音化と舌内入声音への合流过程——中世博士家训点资料からの迹付け——》,《国语学》25 集,第 67—79 页;服部四郎、龟井孝、筑岛裕编《日本の言语学》第 7 卷,大修馆书店 1981 年版,第 44—64 页。

“杂”、“立”、“执”三字在个别词里念-u 尾,如“杂巾”(抹布)zoukin、“执念”(执意)shuu'nen、“建立”(兴建佛教建筑)konryuu,这些算是正规读音的遗留。

2.6 如表二所示,中古汉语的-t 在少数数字的吴音中读成-chi,即:

“一”ichi、“壹”ichi、“七”shichi、“八”hachi、“质”shichi、“日”nichi、“吉”kichi、“钵”hachi、“罚”bachi、“拨”bachi。

这些字都是古代以来日语常用的汉语借词,其所代表的观念或物品跟一般民众的生活都有密切关系。“罚”念 bachi 就意味着神佛的报应,违反法律或社会道德所受的责罚则念 batsu;“拨”念 bachi 表示乐器的拨子,其他涵义都念 hatsu;“质”念 shichi 表示抵押,其他涵义都念 shitsu。此外有些-tsu 尾字在特殊词语中念做-chi 尾,如“结缘”(佛教语)kechien、箏箏(古代乐器)hichiriki。如在 2.4 中所说,这些都是古代日语中汉字白读的遗留。

三、促音化

3.1 在现代日语中,入声字在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复音节词中间而位于清辅音(即 h-、t-、ts-、ch-、k-、s-、sh-)之前,就往往发生“促音化”(下文称“促化”),即反映汉语入声韵尾的-u、-tsu、-chi、-ku、-ki 替换为喉塞音位-ʔ。这个音位-ʔ 在语音层次上同化于后面的清辅音,各以[-p]、[-t]、[-k]、[-s](皆带紧喉)来实现,例如“一个”ichiko 替换为 iʔko[ikko]、“一生”ichishou 替换为 iʔshou[issō]。这种促化音在罗马字拼法上以与后面的辅音相同或相似的 p、t、k、s 来表示(如“一个”ikko、“一生”issō),假名拼法上则不管后面的辅音如何都用小写“っ”(平假名“つ”)来表示(如“一个”イッコ)。要注意:这些促化音并不是汉语式的韵尾,而是类似一个音节的,虽然[-s]以外没有什么声音可听,但这些“无声”辅音略占一个音节的幅度,例如“一个”ikko 的音长略与三音节词“一时”ichiji 相等。促化在与动词-suru(做)复合时也发生,如“罚する”bassuru(处罚)。

如 2.2 所述,古代日语的 *p- 后来在一个词的开头变为 h-,但在前面的入声字促化时就恢复原来的 p- 音,如“十杯”(juu 加 hai)替换为 juppai,“八方”(hachi 加 hou)替换为 happou。

促化现象是在日语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种音变,固有的日语词中也有同样经过促化的例子,如 tattoi(尊贵,< *taputoki)、katta(买了,< *kapitaru)、motta(带了,< *motitaru)。促化音在平安时代末(12 世纪)已存在,当时促音音位是音节性的 *-t,后来才变为喉塞音位-ʔ^①。

在表 3 举出了入声字作两字词的前字念促音的例子,每框记 2 例。这些例词只有促化形式,没有非促化形式与之并存。

表 3 入声字在两字词中“促音化”的规律

	h-(→p-)	t-,ch-,ts-	k-	s-,sh-
-u	“合并”gappei “十本”juppon	“纳得”nattoku “甲冑”katchuu	“集解” ^② shikkai “法华”hokke	“合作”gassaku “合唱”gasshou
-tsu	“疾风”shippuu “突破”toppa	“绝对”zettai “密通”mittsuu	“结婚”kekkon “实感”jikkan	“喝采”kassai “笔势”hissei

① 如在上例 tattoi 等举例中能看到,促音 *-t 曾经在日语固有词中只出现在复音节词的中间,在汉语借词中则亦出现在词末(看 2.4)。这是在当时的音系中汉语借词的一个特点。

② “集解”只见于《论语集解》等汉籍书名中,一般人不用。